

中以建交为何拖延了 40 多年

陈来元

中国和以色列从 1950 年 6 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而直到 1992 年 1 月才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建交被拖延了 40 多年,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

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并因其文化具有许多接近甚至相同的地方,在感情上紧密相连。自古以来,许多犹太人在中国安居乐业,有的还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做过官。两个民族一向相安无事,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犹太人在世界上备受欺凌、特别是惨遭纳粹疯狂屠杀的时候,逃亡到中国的犹太难民却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和热情帮助。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中国的科技、文化和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这种

历史、文化和感情的纽带,是以发展关系的一股强大动力。

以色列国于 1948 年 5 月成立时,包括新华社和《冀中导报》等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同样,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时,以色列也表示热烈欢迎,并于 1950 年 1 月 9 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对此,周恩来总理复电表示感谢,鉴于以色列与中国前国民党政权没有关系,因此中以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两国建立邦交的双边问题。于是,1950 年 6 月,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建交谈判。同年 9 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

本来,双边关系不断升温,两国不久就会建交的前景十分看好。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建交谈判的形势逐渐发生了逆转。两国在莫斯科开始建交谈判后不久,以色列外交部就指示其驻苏联代表:在远东

国书的报道,都要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陪同在座”。余心清在创建新中国礼仪、礼宾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潮下,把礼仪、礼宾工作视为“封、资、修”的东西,曾以“肃清余心清影响”的罪名,进行过错误的批判。余心清与齐燕铭是亲密战友,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中曾并肩作战,结为挚友。在新政协筹备会和政府办公厅又朝夕相处,情如手足。1966 年“文革”初期,余心清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齐燕铭任全国政协秘书长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 年 10 月 9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这时,齐燕铭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主持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几天后,便是齐燕铭的追悼会。这种生死相连的革命友谊,是感人至深的。1981 年 3 月 13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和中央统战部几位部长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充分肯定了余心清同志革命的一生和他主持典礼局的光辉业绩。

责任编辑 许水涛

局势发展未明朗前，不再与中国就建交问题采取任何具体步骤。1951年2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指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在美国的压力下，追随美国的以色列政府停止了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谈判。这样，中以两国就失去了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次良机，其根源在于美国敌视中国，直接责任当然在屈服于美国压力的以色列政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趋向缓和。1954年，中英建交。接着，中美之间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逐步改善给中以建交带来了新的机会。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

科亨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了哈科亨，并邀请他访问中国。1955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哈科亨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期间，他和随团的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与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亚非司司长黄华讨论了建交问题，甚至谈到未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馆址和如何处理上海犹太人的财产问题。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以色列一些政界要人对以中建交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美国的压力不可忽视，担心这会影响到美关系。在阻止中以建交问题上，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哈科亨虽与中方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但仍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指示，将重点放在讨论两国贸易问题上，对建交未作任何具体承诺，只是邀请中国方面也派一个代表团回访以色列，以进一步商讨有关事宜。这样，中以建交谈判再遭挫折。

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鉴于万隆会议召开在即，中国方面也不愿在万隆会议前夕加快与以方



陈来元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前

建交谈判的步伐，故对以方发出的访以邀请未作具体答复。结果，万隆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从而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以色列一看着了慌，于4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方面，表示它“决定在近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7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又以私人身份访华，企图游说中方与以色列建交，但中国方面则回避与以方讨论在近期内建交问题。

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决定对其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发展与阿拉伯的关系这一方面来，于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迅速发展。从1956年5月到9月，中

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直到此时，中国仍未放弃发展中以关系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当时表示，我们不应与一方建立友好关系而排斥另一方。

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以色列立场的事件是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鉴于以色列对这场危机的立场，中国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20年漫长的冻结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发展，以色列也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追随美国，另一方面则是阿以之间冲突不断，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更使相互关系日益恶化，而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关系则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以色列一再主动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但中国从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的原则立场出发，对以色列的示好不予理睬。以色列为与中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不但做到了骂不还口，还始终保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不与台湾当局发生政治、官方关系，坚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尽管在中以关系完全冻结的情况下，两国就双边



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右五)与到访的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后排左二)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右四为本文作者

关系本身而言，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

中以关系逐渐恢复经历了十四年

鉴于1955年4月以来以色列对同中国建交再没有发生过动摇，故中以建交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实际上始终掌握在中国手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逐步得到了恢复、改善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了和解，阿以关系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这些都对中以关系的逐渐解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对立依然存在，中国的立场依然是继续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同时考虑到众多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中国与广大阿拉伯国家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如当时中阿年贸易额已达到十几亿美元，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人员已有数万之众)，中国不希望因发展对以关系而失去阿拉伯世界。因此，在中阿关系牵制中以关系的情况下，中国调整对以政策只能是逐步“微调”，与以色列改善和发展关系也只能小步走，而每走一步都要将阿拉伯一大片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1977年以来，中国开始调整对以政策，以逐步恢复与以关系。到1991年，中国调整对以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中以关系解冻作舆论准备。在这一段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

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的报刊上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向以色列及中东问题有关各方逐步发出中国调整对以关系及中东政策的信息。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中国的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方面表示这一立场是1956年以来的第一次。1978年，中国领导人耿飆首次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这个改变在以色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1980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的内容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1988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除中东问题政治解决、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支持各方对话、巴以相互承认及阿拉伯与犹太两个民族和平共处等内容外，还包括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土，同时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这就比1980年的三条又前进了一步。

第二是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在此期间，两国主要通过香港中转，由中间商来开展经贸合作。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则更显成效，尤其在航空、医药、化工、水利、农业及其他一些高科技领域，双方合作发展较快。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也逐渐起步，两国学者相继实现了互访。1989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护照的人入境，此后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日益增多。此外，两国



1994年6月21日，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武官许林根大校(右一)宴请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巴拉克中将(左二，后来任以色列总理)，左三为本文作者

一些政党和社团也进行了一些互访，如自1987年起，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还有以色列工党及以色列争取中东和平国际中心，先后组团访问了中国。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以色列。

第三是与以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开展并逐步升级。从1987年3月至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朱应鹿等官员先后在纽约和瑞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塔米尔和以外长政策顾问诺维克，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提高会晤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同年9月30日，吴学谦外长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如此高级别的会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1989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以色列新任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以保持接触，作为双方联系渠道的建议，并表示中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东形势和以色列政策的变化。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6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不但已经恢复，而且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谈提高上述两个处的职能问题。同年5月，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以，双方商定将两处提高到半官方地位。

中东和会的召开使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这是中东形势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是自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密切关注。

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两国实现建交终于水到渠成。首先，鉴于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已经打破长期不接触、不谈判的僵局，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谋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那么中国与以色列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实现突破，从而建立外交关系，就无需太多地考虑阿拉伯一大片的影响和牵制了。其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与中东关系密切的大国，现在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



1995年，陈来元参赞在以色列—中国友谊协会举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上发表讲话。右一为以中友谊协会主席考夫曼，中为以中友谊协会成员之一

正参与进去，在阿以双方做促和工作并切实发挥积极作用，不实现中以关系正常化显然是不行的。再次，在中东和平进程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东欧及独联体国家，乃至蒙古等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中国与以色列实现建交将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新形势下，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故中以建交也不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犹太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我做该集团的友好工作，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91年11月，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形势分析片会，我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中东处处长随司长王昌义赴约旦首都安曼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应立即着手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于1月24日与中方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终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作者曾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驻莱索托大使和驻纳米比亚大使。）

责任编辑 张建安

纵 横 导 读

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上世纪 70 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中,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可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其影响之大、株连范围之广、牵连重大历史问题之紧密,都是其他冤案无法比拟的,成为平反浪潮中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正是一贯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陈云注重把握历史时机,排除干扰,多谋善断,推动完成了这一艰难的工程。

建国后,我与贺龙元帅的交往

贺龙元帅深知文艺工作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那么爽快地在严寄洲的订婚报告上写下大大的“贺龙”二字?为什么在有人商议调严寄洲当他的秘书的时候,他会连连摇头:“亏你们想得到,严寄洲是业务创作干部,怎么能让他当秘书?”为什么在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人向严寄洲发难的时候,他马上提出客观而公正的意见?……贺老总早已含冤而去,但严寄洲对他的思念却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淡漠。

张闻天之子的坎坷人生

作为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的命运注定要和父亲的沉浮联系在一起。幼年坐牢、中学毕业后下乡、被大学勒令退学、再赴新疆“文革”中的遭遇……张虹生经历了种种逆境,是父亲面对危难的不屈品格无声地影响着他、始终支撑着他。

“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

赴法勤工俭学,与许多共产党人相识相知;参加国民党“一大”,成为国民党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40年代发起组织“小民革”、“民联”、“民革”,加入知名民主人士的行列;解放战争时期,冒险从事地下策反,秘密营救张澜、罗隆基;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参事室主任。这独特的身份演变表现了郭春涛独特的人生之路,展示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风采。

中以建交为何拖延了 40 多年

1950年,在中以两国的交往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1月,以色列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6月,双方开始建交谈判;9月,以色列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发生了大逆转,两个优秀民族建立正常关系的时机被一再延误,直到1992年。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以关系究竟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与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有什么关联?资深外交官陈来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案。